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用詩與解詩：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兩種型態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31-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9年01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車行健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邱怡瑄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殷宜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依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徐其寧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許聖和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年05月02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用詩與解詩：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兩種型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31-

執行期間：97年8月1日至99年1月31日

計畫主持人：車行健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邱怡瑄、陳殷宜、吳依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30 日

用詩與解詩：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兩種型態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摘要：

漢代《詩經》詮釋傳統具有「用詩」與「解詩」這兩個面向，用詩的面向是承襲先秦時人應用《詩經》的風尚，而解詩的面向則是表現出對《詩經》詩義的說解。漢代的《詩經》詮釋傳統既然具有這兩種不同的面向，因而其外在樣貌雖然看似是對《詩經》文本意含的詮釋，也展現出一套套的解經成果或詩學家派。但細繹其內涵，卻不難發現其中有不少是針對政教的目的所做出的特殊義理闡發或政論，甚至其本身也被投入在實際的政治場域的應用中（如王式以三百篇為諫書）。研究漢代《詩經》詮釋傳統，若只從其所呈現的解經面貌來看待，而忽視了其用詩性格的話，一味逕從解經、詮釋的角度來評騭其是非得失，則不但無法察究其真實內涵，且反易生許多無謂的糾葛。

本計畫（〈用詩與解詩——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兩種型態〉）擬從「用詩」與「解詩」兩個面向，來對漢代《詩經》詮釋傳統做一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從歷史淵源與實際的現實環境之制約來分析漢代《詩經》詮釋中的用詩特性，另一方面，則從漢代經學解經的形成與客觀學術發展的脈絡，來探討擺脫用詩習尚，回歸《詩經》文本意義與作者原意詮解的漢代《詩經》解詩活動之產生。

關鍵詞：用詩、解詩、詩經

一、報告內容：

1. 前言

漢代《詩經》詮釋傳統具有「用詩」與「解詩」這兩個面向，用詩的面向是承襲先秦時人應用《詩經》的風尚，而解詩的面向則是表現出對《詩經》詩義的說解。漢代的《詩經》詮釋傳統既然具有這兩種不同的面向，因而其外在樣貌雖然看似是對《詩經》文本意含的詮釋，也展現出一套套的解經成果或詩學家派。但細繹其內涵，卻不難發現其中有不少是針對政教的目的所做出的特殊義理闡發或政論，甚至其本身也被投入在實際的政治場域的應用中。本年度的計畫研究重點在考察漢代《詩經》詮釋傳統中的用《詩》面向及實用性格，以期能對漢人解《詩》之實質能有更具體深入的認識。

2. 研究目的

漢代的《詩經》詮釋，不論是今文的魯、齊、韓三家，或古文的毛詩，其形成雖在漢代，但無論是對《詩經》意義的說解，或對《詩經》性質的理解與掌握，應該皆有其先秦的淵源。傳統經學史對漢代四家《詩》學的師承與傳授淵源的描述容或有可疑之處，但先秦《詩經》學的前導與奠基之功應也是不容否認的。先秦時人對《詩經》的把握主要還是著眼於應用上，顧頡剛（1893-1980）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曾專立一節討論「周代人的用詩」，他認為：

《詩經》是為了種種的應用而產生的，有的是向民間采來的，有的是定做出來的。牠是一部入樂的詩集；大家對於這些入樂的詩都是唱在口頭，聽在耳裏，記得熟了，所以有隨意使用牠的能力。他們對於《詩》的態度，只是一個為自己享用的態度；要怎麼用就怎麼用。但他們無論如何把詩篇亂用，卻不豫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所以雖是亂用，卻沒有傷損《詩經》的真相。¹

顧頡剛的用詩說包括兩個重點：一、用詩與《詩經》的形成，其方式主要就是透過民間採集與特別定作的。二、用詩與《詩經》真相的關係。顧頡剛雖強調孔子以前的周代人「無論如何把詩篇亂用，卻不豫備在詩上推考古人的歷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因而「沒有傷損《詩經》的真相」，但他也指出孔子之後的戰國及漢代儒者的用詩行為確有可能會對《詩經》真相造成傷損。²如果《詩經》的真相就是《詩經》的本義的話，那被戰國及漢代儒者的用詩活動所「傷損」後的《詩經》面貌就應該是漢代以來所衍生出的種種《詩經》「衍義」或「多重義」了。

不過，先秦時人對待《詩經》的態度固然主要是著眼於應用上，但是否也有著眼於《詩

¹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翻印，1987年），第3冊下編，頁344-345。

² 顧頡剛此意參〈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頁363-367。

《詩經》自身上的意義說解？這種情況應該是有的，孔子、孟子、荀子等儒者皆有許多論述《詩經》的材料，似乎可以印證先秦時人亦有在非應用目的的情況下來說解《詩經》的。不過這些春秋戰國儒者的《詩經》說解大多仍是帶有濃厚的道德或倫理的意涵，亦仍不脫用詩的傾向。但這種具有用詩傾向的《詩經》說解活動畢竟仍開啟了漢代經師的《詩經》訓解活動。有了這個認知之後，就不難對漢代《詩經》詮釋中的「諫書說」、「美刺說」、「主文而譎諫」、「溫柔敦厚」等具有強烈政治實用的主張感到奇特了。而在這種風氣籠罩下的漢代《詩》學，其對詩義的說解就遠離了《詩經》文本的「本義」或作者的「原意」，因此這種「以詩為用」的經義說解方式也與後世秉持著客觀嚴謹，以學術自身目的為導向的「詮釋」觀念大相逕庭。但就《詩經》詮釋在漢代的發展而言，何時才較明確地出現了「詮釋」的觀念呢？東漢初的班固對魯、齊、韓三家所發的「咸非其本義」一語可能是個重要的關鍵點，班固的概念應是承襲劉向、劉歆父子而來的。由此可知，具備較嚴格學術意味的《詩經》「詮釋」觀念至遲在西漢中末葉時可能就已形成了，而此無疑是與劉向、歆父子校讎圖書的事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柯馬丁(Martin Kern)從「寫本文化」(written textual culture)的角度對此現象做了一番解釋，其云：

當秦和西漢欽定的博士掌管經籍的研究和傳授時，當書本和學說依照聖旨被收集和編目、或被銷毀和審查時，當皇家的最高學府和圖書館變成官僚精英受教育和被挑選的中心時，傳統經典的書寫形式一定要被賦予一種那時還不為人所知的重要性。劉歆是第一個主張寫本要優於口傳本的人，而《左傳》提供的歷史的事件，使《毛詩》得以重新構建了以創作為中心的《詩》的歷史。³

當經書的書寫形式被高度重視後，也就意味著有所謂「固定文本」的產生，而在形塑此固定文本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對此文本的年代、編排、流傳、內容與作者等問題加以研究，或許「詮釋」或「解詩」的觀念就於焉形成了。

由此可知，漢代《詩經》詮釋傳統明顯具有「應用」與「解經」這兩個面向，其樣貌是對《詩經》文本意含的詮釋，因而所展現出的是一套套的解經成果或家派。但若細繹其內涵，則又可發現裏面有不少是針對政教的目的所做出的特殊義理闡發或政論，甚至其本身也被投入在實際的政治場域的應用中（如王式以三百篇為諫書）。研究漢代《詩經》詮釋傳統，若只從其所呈現的解經面貌來看待，而忽視了其用詩性格的話，一味逕從解經、詮釋的角度來評騭其是非得失，則不但無法察究其真實內涵，且反易生許多無謂的糾葛。誠如陳澧（1810-1882）所觀察的：

《漢書·藝文志》云：齊、魯、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

³ 見氏撰：〈出土文獻與文化記憶——詩經早期歷史研究〉，收入《經學今詮四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41-142。

「《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徇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⁴斷章取義、觸類旁通所形成的《詩》義，本來就不是因應著詮釋活動的目的而產生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對《韓詩外傳》「不專解《詩》」的評論確是一針見血之論。有鑑於此，本計畫（〈用詩與解詩——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兩種型態〉）擬從「用詩」與「解詩」兩個面向，來對漢代《詩經》詮釋傳統做一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從歷史淵源與實際的現實環境之制約來分析漢代《詩經》詮釋中的用詩特性，另一方面，則從漢代經學解經的形成與客觀學術發展的脈絡，來探討術擺脫用詩習尚，回歸《詩經》文本意義與作者原意探討的漢代《詩經》解詩活動的產生。

3. 文獻探討

關於用《詩》活動的探討，顧頡剛在民國十二年所寫就的〈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收錄在《古史辨》第三冊下編）堪稱奠基之作，在此文中的第二節，顧氏的標題就題作「周代人的用《詩》」，在其中他正式的標舉了「用《詩》」這個概念與術語，並且歸納了四種《詩》的用法，即典禮、諷諫、賦詩和言語。趙沛霖在回顧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時，就曾對顧頡剛的「用詩說」加以高度的評價，其云：

關於周代人的「用詩」，顧頡剛提出了更多的值得研究的問題，其中，特別是結合大量史實對於「賦詩」和「言語」的論述，可以說是《詩經》學術史上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次全面系統的研究。對於《詩經》的這種特殊經歷的考察，在《詩經》研究史，乃至一般學術史上都可謂是別開生面：一般的學術史都是考察歷代學者及其著作的意義價值和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並作出相應的評價，絕少顧及作品的「社會經歷」和應用情況。而顧頡剛卻在詩與其流傳的社會環境、詩的價值與人們對於詩的觀念的統一中對此做了全面、系統地考察。他的這種「創舉」，使《詩經》的這種特殊的社會經歷昭然于世。正是這段特殊的經歷對於《詩經》學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⁵

正是因為顧頡剛所提出的「用詩說」含蘊了巨大的學術能量，影響所及，許多《詩經》學的論著幾乎都不可避免地會從「用詩」這個角度去探討相關的問題，如夏傳才的《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及《詩經講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袁長江的《先秦兩漢詩經研究論稿》（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戴維的《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與洪湛侯的《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等人的專著都用了相當的篇幅來對此加以討論。至於單篇論文論述及此的，數量亦相當可觀，如孔慧云的〈左傳用詩初探〉、王則遠的〈左傳中的用詩〉、傅道彬的〈孔子詩論與春秋時代的用詩風氣〉、王碩民〈韓詩外傳用詩論〉及郜積意的〈使用與闡釋：先秦至漢代詩經學的理论描述〉等（詳見下「重要參考文獻」）。總體來看，這些成果雖也取得一定之成績，但無論從研究議題之設定、論述方式、方法論運用及實際論

⁴ 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外一種）（楊志剛校點，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1版），卷6，頁107-108。

⁵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78。

點等各方面來看，這些後繼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仍不脫顧頡剛的規模。其中較值得稱道的是郜積意在〈使用與闡釋：先秦至漢代詩經學的理論描述〉一文中已敏銳的注意到在先秦兩漢時期的《詩經》學相關論述中已有「使用」與「闡釋」這兩種不同的闡釋類型的出現。

此外，不同於固守《詩經》領域所作的專門探討，顏崑陽教授近年來所陸續發表的一系列「中國詩用學」的論著，便在取徑與實際成果方面展現不少新意，從而突破了顧頡剛的既有論述格局。顏教授三篇詩用學論文：〈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建構中國詩用學二論〉、〈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建構中國詩用學三論〉，基本上係從「社會文化行為」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的種種詩用現象。其所謂「中國詩用學」雖不專指《詩經》，而是泛指所有中國的古典詩歌，但其在第二篇文章中以先秦詩用行為為探討對象時，便直接的涉及到《詩經》的應用問題。顏教授將建基於「《詩》文本情境」與「禮文化的社會背景情境」的先秦種種《詩》用行為，從一理解與詮釋的角度，將其視為一種「詮釋範型」，而從其內涵與本質來看，它實際上是「儒文化的詮釋範型」，再從中國詮釋學史的時間歷程來看，又可說是「原始型的詮釋範型」。顏教授以「社會文化行為」為切入點，最後卻落實於中國詩歌詮釋學的研究進路，內涵相當豐富，亦極具啟發性，雖然他並沒有直接的處理到《詩》用行為或用《詩》活動與《詩》義形成的關聯，但他的研究還是提供了吾人鑽研此問題時的許多有利線索。

再就漢代《詩經》詮釋的相關探討而言，何定生教授在《詩經今論》一書中追溯漢儒將《詩經》「諫書化」的淵源，並且細緻地分析漢儒「諫書」思想的內涵。屈萬里教授在〈先秦說詩的風尚和漢儒以詩說教的迂曲〉分析漢人詩教說的形成原因和背景，並且也比較了先秦人的說詩與漢人的不同，前者大體上只採取詩中的嘉言做為修身、從政和應對之用，而後者則把各詩的全篇皆說成在政治教化上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有這樣的不同，所以先秦人的說詩並不影響各詩篇的本義，而漢儒之說，對於各詩篇原來的作意，大部分都曲解了。裴普賢教授亦曾指出《毛詩序》與春秋時代賦《詩》斷章取義、引《詩》摭句為證及孔門論《詩》等偏重於政治的應用，倫理的教訓，品德的修養所發展出的溫柔敦厚《詩》教的影響。（《詩經研讀指導》，頁23。）這些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今日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至於大陸方面，近年來也出版了不少漢代《詩經》學的專著，如劉志立的《漢代詩經學史論》、趙茂林的《兩漢三家詩研究》、王妍的《經學以前的詩經》、馬銀琴《兩周詩史》等論著亦皆有可觀之處，有些甚至在細部的文獻方面下了極大的工夫，如趙茂林細密地比較四家詩之異同，馬銀琴《兩周詩史》將孔子詩論與漢代四家詩說的比對等。不過整體上來說，在方法和視野上仍沒有太大的突破，就用詩和解詩這兩個議題的探討，也未見有較精深的處理，這些都是仍有可為者。

4. 研究方法

本計畫預定採用的理論進路及研究方法有下列幾種：

一、解釋學的進路與方法。本計畫既以漢代《詩經》詮釋為探索主軸，則解釋學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與詮釋的相關理論還是極具參考價值，而這也是吾人一貫關注與持續運用的

主要研究方法。與本計畫較有關且可取來參照的重要理論，除了哲學解釋學權威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對解釋的歷史性的探討，傅偉勳所提出的「創造的詮釋學」外，義大利文論家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與西方當代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關於「詮釋」與「使用」的探討與分疏亦對本計畫在方法論及理論上的省思及辨析上頗有啟發。

二、學術史的視野與取徑。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形成固然有其內部的理論脈絡，因而吾人可以借助當代的理論來加以觀照，但若只單從這個角度來把握，卻忽略了外在歷史環境的型塑與制約作用，仍是無法將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整個發展與演變過程有較全面且透徹的了解。因此，學術史的研究取徑在此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歷史史實的呈現、淵源來歷的追蹤、演變之跡的察考、《詩經》詮釋與外在現實環境的互動、經學的師承家法、圖書目錄學中所反映的學風演變、訓詁章句之學與《詩經》詮釋的關係……，這些屬於學術史或經學史中的問題相信也惟有運用學術史的研究方法才能有效的加以解決。

5. 結果與討論

漢人《詩經》詮釋傳統中的用《詩》面向是個複雜的問題，所涉及的層面也頗廣，它不但只是經典內部的問題，也不能只單純的看做是解經或詮釋的問題，它既是學術內部的事情，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而且更和政治、教育與教化問題糾結在一起，很難分割來處理。從表面來看，今天留存下來的漢代四家《詩》似乎都是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但究其實，其解經的內容似皆脫離不了政教的關聯，或甚至是一種政治教化下的產物，其性質應與宋代以後興起的所謂「經筵講章」之類的東西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吾人關注。或許可以這麼說，從教育與教化的角度來說，漢代四家《詩》的解經作為實際上就是對君王、貴族及有希望晉身統治階層的士大夫們的教材及施教內容；但若從政治的角度來說，《詩經》文本及解釋《詩經》的內容皆可以做為君臣施政得失的戒鑑參考內容。臣子固然可以《詩經》（文本及解經內容）為諫書或議論時政的重要依據及參考，而君王也同樣可以《詩經》（文本及解經內容）為其施政的重要依據及參考。此所以兩漢《詩經》的主要應用場域往往在實質的政治操作中，而保存這類用《詩》材料最多的也正在政治場域中的帝王詔書及群臣奏議中。

二、參考文獻：

1. 《詩經》學相關論著

- 《毛詩正義》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 年
《詩本義》 歐陽修撰 《四部叢刊》本 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經部》 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 1971 年出版
《詩集傳》 朱熹撰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89 年 12 版

- 《詩毛氏傳疏》 陳奐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6 年出版
- 《毛詩後箋》 胡承珙撰、郭全芝點校 合肥：黃山書社 1999 年 1 版
- 《毛詩傳箋通釋》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 1 版
- 《讀風偶識》 崔述撰 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56 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4 年
- 《詩古微》 魏源撰、何慎怡點校 長沙：嶽麓書社 1989 年 1 版
- 《詩本誼》 龔橙撰 《半厂叢書》本 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08 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 年出版
- 《詩經原始》 方玉潤撰 《雲南叢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81 年 3 版
- 《詩三家義集疏》 王先謙撰、吳格點校 臺北：明文書局 1988 年初版
- 《韓詩外傳箋疏》 屈守元撰 成都：巴蜀書社 1996 年 1 版
- 《詩經詮釋》 屈萬里撰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3 年出版
- 《詩經今注》 高亨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 《詩經注解》 程俊英、蔣見元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 1 版
- 《詩經六論》 張西堂撰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57 年出版
-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 孫作雲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66 年 1 版
- 《詩經今論》 何定生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8 年出版
- 《詩三百篇探故》 朱東潤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 《詩經研讀指導》 裴普賢撰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7 年再版
- 《詩經欣賞與研究》(1 至 4 冊) 靡文開、裴普賢撰 臺北：三民書局 1991 年出版
- 《詩經學論叢》 江磯編 臺北：崧高書社 1985 年出版
- 《詩經研究論集》 林慶彰編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3 年初版
- 《詩經研究論集·二》 林慶彰編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7 年初版
- 《詩經研究史概要》 夏傳才撰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3 年 1 版
- 《思無邪齋詩經論稿》 夏傳才撰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0 年
- 《詩經研究史》 戴維撰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 《詩經學史》 洪湛侯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出版
- 《詩經的歷史公案》 李家樹撰 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傳統以外的詩經學》 李家樹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 《從經學到文學》 劉毓慶撰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 年
- 《先秦兩漢詩經研究論稿》 袁長江撰 北京：學苑出版社 1999 年
- 《中國政教文學之起源—先秦詩說論考》 陸曉光撰 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 1994 年
- 《左傳賦詩引詩考》 楊向時撰 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1972 年
- 《左傳稱詩研究》 張素卿撰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91 年
- 《左傳賦詩引詩之詩教研究》 曾勤良撰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
- 《孔子詩論述學》 劉信芳撰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 黃懷信撰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 《孔子詩論研究》 陳桐生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

- 《詩序新考》 程元敏撰 臺北：五南出版公司 2005年
- 《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 趙沛霖撰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6年
- 〈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 顧頡剛撰 收錄於《古史辨》第三冊下編 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1987年初版
- 〈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 屈萬里撰 《史語所集刊》34本下 1963年12月
- 〈先秦說詩的風尚和漢儒以詩教說詩的迂曲〉 屈萬里撰 收錄於《屈萬里先生文存·一》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5年
- 〈詩三百篇之采集與刪定問題〉 陳槃撰 載於《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一》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8年
- 〈采詩和賦詩〉 夏承燾撰 《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 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8月
- 〈使用與闡釋：先秦至漢代詩經學的理论描述〉 郜積意撰 《浙江學刊》 2000年第5期
- 〈左傳用詩初探〉 孔慧云撰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年7月
- 〈左傳中的用詩〉 王則遠撰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 〈孔子詩論與春秋時代的用詩風氣〉 傅道彬撰 《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
- 〈關於毛詩序作者問題的商討〉 王錫榮撰 《文史》第10輯 1980年
- 〈關於毛詩序的作者問題〉 朱冠華撰 《文史》第16輯 1982年11月
- 〈試論毛詩序〉 曹道衡撰 收錄於《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 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 1999年
- 〈毛詩關雎篇序傳箋疏之詮解及其解經性格〉 張寶三撰 收錄於《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2年
- 〈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鑒別〉 葉國良撰 《國立編譯館館刊》9卷1期
- 〈朱熹詩序辨說述義〉 楊晉龍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期 1998年3月

2. 經學與經學史

- 《周易正義》 王弼注傳、孔穎達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年
- 《周易集解》 李鼎祚撰 《古經解彙函》本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76年再版
- 《尚書正義》 偽孔安國傳、孔穎達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年
- 《周禮注疏》 鄭玄注、賈公彥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年
- 《周禮正義》 孫詒讓撰 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 北京：中華書局 1987年1版
- 《儀禮注疏》 鄭玄注、賈公彥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年
- 《儀禮正義》 胡培翬撰、段熙仲點校本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3年1版
- 《禮記集解》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本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0年1版
-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撰 王文錦點校本 北京：中華書局 1983年1版
- 《左傳正義》 杜預集解、孔穎達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年
- 《左傳會箋》 竹添光鴻撰 臺北：天工書局 1988

- 《春秋左傳注》 楊伯峻撰 臺北：洪葉公司 1993年修訂本
- 《春秋公羊傳注疏》 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
- 《論語注疏》 何晏集解、邢昺疏 南昌府學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 1993年
- 《經學通論》 皮錫瑞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9年臺5版
- 《經學通論》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等撰 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1996年出版
- 《經學歷史》 皮錫瑞撰、周予同注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3年初版
-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2年臺1版7刷
- 《經學史》 安井小太郎等講述、林慶彰、連清吉譯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6年
-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徐復觀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0年初版2刷
- 《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 李威熊撰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年初版
- 《中國經學史》 吳雁南等撰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出版
- 《中國經學史》 許道勛、徐洪興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 《中國經學史十講》 朱維錚撰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年出版
- 《經學側論》 葉國良撰 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年
- 《經學研究論集》 胡楚生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2年
- 《中國經學思想史》 姜廣輝主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出版
- 《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 林慶彰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2年
- 《經學今詮初編》 《中國哲學》編輯部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年
- 《經學今詮續編》 《中國哲學》編輯部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1年
- 《經學今詮三編》 《中國哲學》編輯部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年
- 《經學今詮四編》 《中國哲學》編輯部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4年
- 《中國經學》第一輯 彭林主編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

3. 史學、文集、筆記、語類

- 《史記三家注》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引、張守節正義 點校本 臺北：鼎文書局 1993年7版
- 《漢書集注》 班固撰、顏師古集注 點校本 臺北：鼎文書局 1991年7版
- 《新校本後漢書》 范曄撰、李賢注 點校本 臺北：鼎文書局 1991年6版
- 《後漢紀》 袁宏撰 《人人文庫》本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5年臺2版
- 《後漢紀校注》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1版
- 《新校本隋書》 魏徵等撰 點校本 臺北：鼎文書局 1993年7版
- 《古史辨》 顧頡剛等撰 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1987年初版
- 《古史續辨》 劉起鈞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年1版2刷
- 《古史考辨》 趙光賢撰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年1版
- 《西周史》 楊寬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9年初版
- 《春秋史》 童書業撰 臺北：開明書店 1974年出版

- 《春秋史》 顧德融等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1版
- 《春秋史論集》 張以仁撰 臺北：聯經圖書公司 1990年出版
- 《戰國史》 楊寬撰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7年初版
-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楊寬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1版
- 《秦漢史》 錢穆撰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5年4版
- 《新編秦漢史》 林劍鳴撰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1992年出版
- 《兩漢學術考》 狩野直喜撰 東京：筑摩書房 1988年初版3刷
- 《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 任繼愈主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1版
- 《兩漢思想史》 徐復觀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3年7版
- 《漢代思想史》 金春峰撰 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 1987年
- 《朱子語類》 黎德靖編 點校本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 陳澧撰、楊志剛校讀 北京：三聯書店 1998年1版
- 《東塾集》 陳澧撰 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461冊 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出版
-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 李學勤撰 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1994年初版
-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李零撰 北京：三聯書店 2004年1版

4. 解釋學相關論著

- 《真理與方法》 加達默爾撰、洪漢鼎譯 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1993年
- 《詮釋與過度詮釋》 艾柯(Umberto Eco)等撰、王宇根譯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年初版
- 《詮釋學》 帕瑪撰、嚴平譯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1992年
- 《理解的真理》 洪漢鼎撰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 洪漢鼎撰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年1版
- 《理解與解釋》 洪漢鼎主編 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1年1版
- 《文學解釋學》 金元浦撰 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年1版
- 《詩學解釋學》 李詠吟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中國闡釋學》 李清良撰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年
- 《中國古典解釋學導論》 周光慶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02年
-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 周裕鍇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 傅偉勳撰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6年初版
- 《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教》 傅偉勳撰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0年初版
- 〈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立課題——從當代德法詮釋學爭論談起〉 傅偉勳撰
收入江日新主編之《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4年初版
- 〈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注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 張鼎國撰
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9卷3期 1999年9月
- 〈中國經典詮釋學的特質座談會紀錄〉 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10卷2期 2000

年6月；又收入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通論篇》 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2002年

5. 其他相關論著

- 《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 艾伯拉姆斯(M. H. Abrams)撰 鄺稚牛等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年
- 《中國文學理論》 劉若愚撰、杜國清譯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1年
- 《比較詩學》 葉維廉撰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8年
- 《中國文學理論史：上古篇》 王金凌撰 臺北：華正書局 1987年
- 《中國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 張雙英撰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3年
- 《語義學》 徐烈炯撰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1996年
- 《語用學與左傳外交辭令》 陳致宏撰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00年
- 〈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 顏崑陽撰 《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人社學院 1999年7月
- 〈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建構中國詩用學二論〉 顏崑陽撰 收錄於《儒道學術國際研討會—先秦論文集》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委員會 2001年11月
- 〈從詩中序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建構中國詩用學三論〉 顏崑陽撰 收錄於《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2年5月

三、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實際執行所完成之研究內容與原計畫書內容大體上頗為符合，且計畫的順利完成亦使本人對漢人解經之實質有更具體深入的認識與掌握。本人在本年度的計畫執行中所完成及進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部分。

一、本人完成了〈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論漢人對《詩經》行役詩的詮釋所蘊含之公私意識與家國矛盾〉一文，發表在98年12月4日由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經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此文從漢人對《詩經》行役詩的詮釋入手，來分析他們對公私倫理意識的看法，以及探討當他們身處家國矛盾衝突的重大問題時的抉擇處境。這個議題的研究呈顯出漢代解經者的現實傾向，亦即他們表面上雖然都在從事客觀的經典詮釋工作，但事實上，經典或詮釋經典的主要目的卻是在為他們身處的現實處境提供存在的依據，而這也無疑是一種用《詩》的態度。

二、本人擬以顧頡剛及其高徒何定生教授的相關研究成果做為研究漢人用《詩》問題的基礎，顧頡剛的議論主要見載於《古史辨》第三冊下編，關注者較多，但何定生教授的研究成果關注者較少，但其發表《詩經今論》中的卷一〈從樂章到諫書看詩經〉卻是有系統地探究漢人用《詩》特性之形成與來歷的重要著作，尤其他從「諫書」的角度來把握漢人用《詩》之實質內涵，更是深具啟發性。循著顧頡剛及何定生二氏的既有研究，相信更能深化吾人對漢人用《詩》問題的認識。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97-2410-H-004-131-
計畫名稱	用詩與解詩：漢代詩經詮釋傳統的兩種型態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車行健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8年12月7日至12月13日
國外研究機構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儒藏中心、清華大學國學院、歷史系經學研究室、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及詩歌研究中心

工作記要：

一、考察日誌

◎12月7日，星期一

上午與中研院文哲所林慶彰教授、蔡長林教授及東華大學中文系吳儀鳳教授一同前往桃園機場搭乘12:55的中國國際航空CA186班機前往北京。

下午四點左右抵達北京首都機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汪學群研究員和牟堅副研究員前來接機，將我們一行人送往下榻的飯店——好苑建國酒店，此酒店由中國婦協經營，位於地鐵東單站，地址是建國門內大街十七號，對面是華夏銀行、新聞大廈酒店，離社科院本部很近。

◎12月8日，星期二

下午去社科院歷史所參訪，林慶彰教授在所內發表專題演講，題目是〈民國時期的中國經學史研究〉，由汪學群主持，反應頗為熱烈，北京師範大學的劉寧教授及歷史所退休研究員顧潮也都到場。演講結束後由歷史所作東宴請我們一行人，席間預定升任歷史所研發處長的樓勁研究員與我們有許多的互動與交流。

◎12月9日，星期三

今天的行程是去首都師範大學參訪。早上八點半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馮蒸教授便到飯店來接我們一行人，大夥搭計程車至首都師範大學。九點半，林慶彰教授在中文系發表一場演講，題目是〈民國時期的鄭玄研究〉，由馮蒸主持，演講結束後，中午由文學院院長趙敏琳設宴款待我們。飯後參觀由趙院長主持的「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該中心頗有規模，有固定的編制人員從事長期的工作，包括製作「國學網」及編輯《中國詩歌研究》、《詩探索》等幾個刊物，還出版了好多本的學術專著。

下午由馮蒸教授夫婦帶我們參觀國子監、孔廟。由於天氣很冷，所以泮池的水面上都結

了層薄冰，遊客也很稀疏，但別有一番景緻。

◎12月10日，星期四

今天的行程是到北大、清華參訪。早上九點十分由牟堅帶我們搭地鐵到北大東門站，汪學群已先在地鐵站等我們了。會合後再走到哲學系，由剛接任的哲學系主任王博出面接招。王博安排林慶彰教授在哲學系靜園會議室發表專題演講。此次演講雖在哲學系的靜園舉行，但實際主辦的單位卻是新近設立的「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此研修基地是為因應全球興起的「漢語熱」，故由政府（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出資在北大設立這樣的一個研修基地。林老師的演講講題是〈民國時期的鄭玄研究〉。演講在11點左右結束，趁午餐前的短暫空檔時間，我們還去了儒藏中心參訪，中午則在北大勺園吃午飯，由王博作東。

下午續到清華大學國學院參訪，由陳來院長接待我們，他對我們做了詳細的介紹，我們一行人也與他做了許多實質的交流溝通，但因林老師事前與歷史系的彭林教授有約，因此我們一行人不得不提前離開。四點十五分左右，在彭林高足張濤的帶領下，我們來到彭林主持的經學研究室參觀。

◎12月11日，星期五

今天的行程主要是去社科院近史所參訪。但在去近史所之前，我們在早上八點五十分先來到社科院本部的「顧頡剛文庫」參觀顧頡剛的藏書。此文庫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五樓，有退休的職工每週來一天看顧。在此文庫內看到不少珍貴的資料，而顧頡剛的藏書中有不少留有顧頡剛的題記，這些資料都有整理出來，收在《顧頡剛文庫古籍書目》的第三卷「題記編、附錄」中。我請在裏面讀書的一位張先生幫忙複製一份給我。

十點半，我們一行人搭計程車到東廠胡同的近史所，此地位於王府井大街附近。到了之後，由近史所的步平所長、金以林研發長、馬勇、左玉河、李細珠研究員及馬忠文副編審等人接待。馬勇是朱維錚的學生，之前也是做公羊學的。茶敘後，去吃午飯。下午到近史所圖書館查資料，本來書庫是不准進入的，但經交涉後，特別讓我們進到書庫看書。我們從書庫出來後，看到南開大學中文系的郜積意教授也從天津趕來見我們。

◎12月12日，星期六

今天由北京學苑出版社的王逸民編輯帶我們去參觀老北大舊址及由林徽音、梁思成設計的，呈門字型的北大女生宿舍。汪學群的夫人武才娃教授的母親當年在北大念書時就曾住在此地。下午則去段祺瑞執政府的舊址參觀。建築外觀雖有些殘破老舊，但依然看得出來建築結構的宏偉。

下午一行人去琉璃廠中國書店買書。中國書店二樓有賣舊書的地方，我和林老師在這邊都找到不少文革時期關於批孔揚秦、儒法鬥爭的小冊子。

晚上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劉寧教授及其夫婿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李四龍教授請大夥晚宴。劉教授是著名學者沈玉成的女公子，家學淵源。李教授專研佛教哲學，也頗有成績。

◎12月13日，星期日

早上八點的飛機，六點就要出發，在搭車前往首都機場的途中，天都還沒亮，月亮還高掛在天上，頗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意境。但到達機場後，發現人聲鼎沸，搭機

的人極多。中午抵達桃園機場。

二、考察成果

此行的主要收穫，大致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學術機構的參訪與交流。此行中參訪了不少北京重要的學術機構，包括社科院歷史所與近史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及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和儒藏中心、清華大學國學院和歷史系的經學研究室，以及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及詩歌研究中心等。這些單位都各有特色，其中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和清華大學國學院都是新設的機構，雖然尚無具體的作為，但經費都頗為充足，展現了二校旺盛的學術企圖心。相較之下，社科院的單位就顯得寒酸多了，尤其是歷史所，在待遇和條件沒有具體提升的情況下，該所的發展受到不小的限制，人才外流嚴重。這種情況正和台灣相反，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資源和學術聲望都較一般大學高，但在大陸，社科院的總體實力卻似乎比不上北大、清大等名校。不過社科院畢竟還是臥虎藏龍的地方，仍有許多單位值得重視，如哲學所、文學所、民族所、語言所等。

二、資料的蒐集。此行有機會參觀社科院的顧頡剛文庫及近史所圖書館，並且也在裏面查了一些與研究相關的資料，算是此行的主要收穫。此外，在北大的儒藏中心也找到日本漢學家中井履軒《孟子逢原》的資料，而在琉璃廠的中國書店更找到不少有價值的舊書。

三、遺跡的考察。此行雖非以考察文物遺跡為主，但在參訪行程中也附帶看了幾處有歷史意義的遺跡，包括老北大舊址及由林徽音、梁思成設計的北大女生宿舍和段祺瑞執政府的舊址。老北大舊址現在改為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其中的舊址復原包括有北大紅樓、北大圖書館、新潮社址及學生大教室等。而紀念館陳列展覽的內容則計有：一、主題陳列和二、專題展覽，專題展覽展出的內容有二，一為蔡元培展覽，二為陳獨秀展覽。在陳獨秀展覽的文物中我們看到展出一張陳獨秀在北大時期的名片，上面只印有「陳獨秀」三個字，其餘完全空白。面對這張如此特別的名片，林老師的解釋是：「大概因為陳獨秀的名氣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是誰了，所以就不再需要印上他的頭銜了。」與此留白極多的名片相反的是龔鵬程教授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的印了他數十個的頭銜，正反面皆有，幾乎沒有留白。他的解釋則是，因為在大陸上活動，經常要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大陸人就吃這一套，所以在名片上印上這麼多頭銜比較好辦事。從名片頭銜留白的多寡，不但可以看到名片主人的個人心態，而且也可以看到民初和現今群眾社會心理的微妙變化，此亦一有趣之現象也！